

新中国第一代同传译员如何诞生

中国重返联合国、特别是1973年中文提升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以来,中文翻译人才紧缺问题凸显。合作开办联合国译员班成为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共识。

1973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格拉布携夫人来华,与外交部国际司和北外代表商谈举办译训班事宜。会谈比较顺利,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

1978年5月25日,联合国副秘书长戴维逊来访,同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冀朝铸等举行会谈,敲定了开办译训班的细节。10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柯前往纽约,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与联合国人事司、翻译司谈判,并达成协议。12月,《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训练中文笔译和口译的方案》获得通过。根据此方案,联合国将提供价值75000美元的电教设备,并为每名学员提供6000美元费用,学员人数每期不超过25人。

过三关的招生

1979年3月底,国务院下达关于译员班招生的文件。招生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和杭州展开。536人参加预试,227人进入初试。7月,复试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这时只剩43人。复试即联合国译训班的人入学考试。考官14人,联合国方面和中方各7人。考题由联合国官员带来,考生按顺序单独面试。考试结束后,联合国官员表示,大部分考生英语水平是好的,超出其想象。

考官团认为来自北外的邵文光和李青原表现最为出色。外交部和联合国方商量后,决定二人不参加培训,于1979年9月直接去纽约联合国总部。他们边干边学,通



过专业考试后被正式聘用。最终录取正式学员25名、口译10人、笔译15人。

从零起步的同声传译课

1979年9月10日,第一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训练班课程分为通识和术语课、语言课、翻译课。

第一学期重在笔译。教学时使用的材料以联合国的会议记录、报告为主,涉及许多专门用词、写法,这些都需要学习和熟悉。北外英语系副主任张载梁给笔译班上报刊阅读课,《经济学人》是最常用的外刊。笔译学员要熟悉各种类型的联合国文件,每周至少要翻译三篇文章。班上有时会有seminar(研讨会),就时事新闻议题进行讨论。崔天凯(后为中国驻美大使)seminar常准备得很充分,发言时总能自信地侃侃而谈。

对于北外来说,开设同声传译课也是从零起步。以前国内只有交传,即翻译站在说话者旁,说话人说一句,翻译说一句。视译是通向同声传译的准备训练。一般人的习惯是停下来听对方讲话,再利用停顿时间进行翻译,这就会造成延误,同传译者必须克服这种障碍,形成同时听、译、说的习惯。

1979年底,联合国提供的设备运到,新语音实验室建成。第二学期开始,口译班学员每人发一台双声道录音机。有了语音室后,培训班每周组织学生看一到两部原版电影。

联合国不定期寄来资料,除了美、英、加等英语国家的,资料中还有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代表的英语发言。中译英的听力材料则是从《人民日报》等报刊上选取契合当时焦点的报道或国家领导人讲话,请同学或老师朗读后录音,尤其要请有四川、江浙沪、河南、山东等地口音的人来读。

训练班学员学习期间,国家正式职工由原单位照发工资,在校生按研究生待遇。

根据和联合国达成的协议,中方要负责修建一栋面积5000平方米的电教大楼。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批准向北外拨款178万元。项目由解放军工程兵部队施工,1983年落成。

联合国里的中文译员

1981年1月,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里奇亲自主持了第一次联合国中文译员的录用考试。来自联合国、外交部、北外的7位考官组成考试委员会,每人一张打分表,分忠实、完整、机智、语言等几项。及格线为70分,但绝大部分考生都取得了80分以上的好成绩。

最后,25人均被录用。口译班10人中,4人分到纽约联合国总部,6人分到日内瓦办事处。笔译班15人中,10人去往纽约,4人去往日内瓦,1人去往内罗毕。

笔译对准确度的要求很高,译员翻译后还要交给审校。有时外交语言模棱两可,译员翻译文件后,一些国家代表团还会找到译员,商量修改用词、表述方式。

虽然中文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但实际上中国代表团是中文口译的唯一服务对象。中文口译员的日常工作是英译中,不过派驻到联合国工作的中方代表都有一些英文底子,并不十分依赖翻译,所以口译员的重头工作是关系到代

表团“面子”的中译英。在重要会议上,代表团有时会指名要某位译员出翻。

多数会议有会前和会期文件供口译准备,但有时开会时却是全新内容。尤其在涉及人权、裁军等问题的答辩时,各国代表常即兴发言。口译员不仅不能有任何错漏,还要能译出中方代表微妙的表达。

按照协议,第一期译训班毕业生要为联合国机构服务3年。1984年9月,郎胜铨和崔天凯携各自夫人从纽约回国。

从译训班到高翻学院

1981年,从第二期开始,联合国译训班学制改为一年。1982年,第三期招生,学制改为两年。这一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四年制大学本科开始毕业,译训班开始以应届生为主。

1989年联合国译员训练部成立10周年时,联合国副秘书长维兹纳来到训练部讲话。他说,中文翻译处在会议记录的翻译上已“迎头赶上”。现在会议记录的中文本已能和联合国其他5种正式语文文本同时分发。译员帮助说中文的代表同其他会员国交流意见,协助联合国秘书处了解中国代表团提供的资料,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发挥着核心作用。

1993年起,北外自己举办了最后一期译训班。1994年,译训班更名为高级翻译学院,纳入全国硕士培养计划。

从1979年到1994年,译训班共开办13期,培养了200多名口笔译员,包括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章启月(第2期)、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第3期)、驻加拿大大使章均赛(第5期)、朱镕基的翻译朱彤(第12期)等。还有大量人员在外事、外语教学部门工作。

鲍安琪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黄金团

樊希安 著
连载之328

站在平台上的于俊政委立即组织施救,等把牛幸娃救上来时,人已奄奄一息,等送到卫生队时,已无任何生命体征。临时泵站保住了,-285米、-250米保住了,已施工完成的那部分斜坡道保住了,取得了阻击海水灌涌的重大胜利,为国家减少了经济损失,确保了金矿工程顺利实施,牛幸娃却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大海垂泪,三山岛含悲。黄金部队十七支队沉浸在悲痛之中。4月中旬,在清明节刚刚祭奠亲人和英烈一周之后,十七支队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由团长梁占刚主持,政委于俊致悼词。于俊和

牛幸娃一起战斗在救灾抢险一线,目睹了牛幸娃排险的壮举,看到了牛幸娃从排险到牺牲的全过程,悼词写得朴实自然,又经过提炼,尤其是讲到水中抢险那一幕,让人有临其境之感,特别是牛幸娃踮慕古秀那一脚,他自己在危险之际,还不忘助战友脱离险境,让许多人痛哭失声,泪流满面。站在队伍中的慕古秀,竟放声痛哭至昏厥,会没开完就被送到卫生队急救。

自然,最为悲痛哀伤的是杨玉琼。杨玉琼不像慕古秀那样号啕大哭,她的泪流在心里,流在心的每一滴泪,都像刀一样刺自己的心肝。她更多的是沉默无语,默默地流泪。即使是开了追悼会、追思会,她也不相信牛幸娃已经不在,总以为他是在掌子面跟班劳动,不定哪一天就回来了。牛幸娃和她开过玩笑,说施工中常有险

情,说不定哪一天就“光荣”了,也戏说过他也许会走在她前面的话,杨玉琼从来就不相信这个话,也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两人结婚后多有离别,即使来到三山岛,牛幸娃忙于施工,也很少在家。家就是个“客栈”,是牛郎会织女的地方。只有他俩在一起,牛幸娃在她身上“播种”的时候,她才感觉他真实的存在,才觉得自己是个有丈夫的人。牛幸娃更多地属于国家,属于部队,属于黄金事业。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因为他有军人的气质和牺牲精神,她才喜欢他。杨玉琼自幼独立生活,家庭观念不重,习惯了两人的分分离离,即使他不在身边,她也能感觉到他的存在,现在她依然认为他存在着,不定哪一天就敲门而归,顾不上脱掉工作服就要猴急地亲热……

追悼会之前的遗体告别,杨

玉琼没让儿子会会参加,她不想让年幼的儿子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不想让儿子受到任何不幸伤痛的刺激,况且,她也不相信牛幸娃真的会离去。

说到儿子“会会”,杨玉琼又是一阵悲上心头。孩子一岁多就失去了爸爸。牛幸娃是多么喜欢会会呀!会会生下来取名的时候,牛幸娃坚持给儿子取名“机会”。他说,我叫幸娃,我儿子叫机会,比我还幸运、比我进步的机会还多。杨玉琼不同意,说这是个什么名字呀,叫起来怪怪的。牛幸娃坚持自己的意见,眼一瞪说:给儿子取名,我说了算。叫“机会”多好,牛机会、牛机会。杨玉琼说:不好,机会是创造出来的,不是叫出来的,过去还有“机会主义”的说法,是贬义。

待续